

第一章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与特征

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与对象范围是一个国家制定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前提，是国家安全需求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的集中反映，体现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安全意志和价值追求。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政策都是其国家性质在文化安全领域的反映，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性质都是由国家性质决定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对象范围也是根据一个国家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认识来划分的。没有对国家文化安全性质的准确把握与定义，就不可能有适合于国家文化安全需求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政策与制度，这是人们认识、了解与把握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性质及其对象范围的理论基础。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全球安全运动与发展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是全球安全运动最重要的国家文化安全运动形态。了解、掌握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和意义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首要问题。

第一节 国家文化安全的含义、性质与意义

国家文化安全是现代人类社会存在与演化的一种基本运动形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安全的其他组成部分——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社会安全、国家军事安全等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运动形态与机制。深刻认识和把握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性质与意义是深刻了解和认识这一机制在国家安全运动中的全部价值和意义的重要途径。

一、文化安全的概念与含义

国家文化安全是由国家、文化和安全这三个不同领域的词语组成的一个集合概念，是由这三个词语构成的不同要素的相互影响和演化而最终形成的一个专有名词、一个特殊的

概念，专门用来指称“国家文化安全”这一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其中，文化安全是核心，国家则用来指称文化安全的属性。

1. 安全与文化安全

安全是相对于危险而言的。危险的一定是不安全的，没有危险就是安全的，这是人们对于“安全”的一般认识和一般经验。因此，安全既是对客观存在状况的评价，也是对主观感受的描述，是主观安全感知与客观安全实际相统一的概念。人们本能地追求安定，追求安居乐业。构成危险的有危害和威胁，即危害和威胁都会造成不安全。对一个生命主体是如此，对一个家庭、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因此在发生天灾（如地震）和人祸（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往往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的第一要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又是一种由社会和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国政府面对新冠疫情突袭所采取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政策措施，体现的就是一种作为国家安全主体的责任担当。生命和财产是人身安全、家庭安全最主要的构成内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民和国土就是这个国家的生命和财产。国家安全首要的就是要保障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即领土安全和人民安全。而要实现和保障国土和国民安全，国家要拥有一种能力，即能够捍卫领土主权和保护人民安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得以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文化反映了人的生存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两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只是把生命财产的存在形式理解为生物性的和物质性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还是社会性的文化存在，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的生命存在方式和价值。因此，人的生命存在不只是生物性的存在，还是更重要的社会性的存在，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生命有机体，核心就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存在。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就在于人是一种具有社会精神性的生命存在。精神性与物质性统一于人的社会性、民族性等。因此，人的生命财产还应该包括人的精神生命财产，如知识产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人的精神生命财产作为人的生命财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生命财产，与一般意义上人的生命财产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命财产的全部内涵。因此，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就同时包括人的精神生命财产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和人类社会都十分重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精神生命财产包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文明。

在当代中国，建设平安中国是国家安全建设的头等大事。“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①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平安”就是指安宁的生活、安全的环境、安定的社会，意味着内心充满安全感。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对平安的需要越来越表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征。平安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生命财产安全上升到安业、安居、安康、安心等各个方面。从国家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防范和打击新型网络犯罪、跨国犯罪以及黄赌毒、盗抢骗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行为到依法开展网络安全监管，开展“净网”“护苗”专项行动，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和个人信息数据安全，平安中国建设惠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老百姓在拥有“富起来”的获得感、幸福感的同时，还获得了安全感。在

^① 2014年10月28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代表和爱民模范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总体性意义上，这种安全感就是人民的文化福祉、人民的文化权益；在国家意义上，这种安全感就是国家文化利益，首先是国家重大文化利益。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包括国家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文化利益，尤其是国家重大文化利益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态，共同构成了平安中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全部安全内容。

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由于所有的安全都是相对存在的，即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危险和威胁的绝对安全，因此文化安全和作为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人民文化福祉和国家其他重大文化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推动文化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文化安全关系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生活方式、核心价值观和文化遗产，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为生存需求的实现提供保障，因此文化安全直接关系着人的整体需求的实现。这是关于文化安全的最一般的含义。

2. 文化安全的形成与发生

文化安全是对人与社会一切矛盾和冲突精神关系的反映，是人类文明演化与社会发展的内生机制。它是在人与自然和社会演进的精神关系矛盾运动中形成和发生的。文化是人类在生命形态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有机体。它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生物学形态。人类通过文化——精神心理系统把自己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通过建构社会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但是，数亿年的进化与演化历程，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与自然界和其他动物所经历的冲突过程，作为某种具有记忆性的基因而成为生命有机体的一部分，即永远的进化构成了人类的生成基因组。其中，特别是关于恐惧和死亡的经验，永远地建立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安全关系。人类所有关于恐惧和死亡威胁的认知都是建立在对自然力的认识这一基础上的。这是人与自然安全关系的起源，也是人类安全感、安全需求和安全概念的起源。

物质生存的竞争必然导致和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竞争。人与自然安全关系的矛盾运动和冲突，在人类进入社会发展阶段后，必然转化和上升为人与社会安全关系的矛盾运动与冲突。当在精神层面上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能力，即形成精神心理认同，便不能有效地形成物质生存上的竞争力的时候，精神心理层面上的竞争就成为物质生存上的竞争在精神心理上的反映，从而形成一种精神文化。这种文化首先是作为一种以共同物质生活为基础的观念形态出现的，而后才作为一种制度出现，即通过建立一种具有约束力和规范性的精神行为体系来提供物质生存竞争力。这就是价值观认同和制度认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于是，物质生存竞争便上升到精神心理和精神意识、精神观念上的竞争，物质层面上的冲突便由此而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上的冲突。冲突必然形成和导致对安全的威胁或危害，构成生存危险，安全问题也随之丰富、扩大、转换、升级，精神文化安全问题便由此而产生。这一竞争性过程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最终形成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关系，以及由这种精神生产关系形成的基于生存（安全）与发展（可持续安全）竞争的矛盾运动与冲突并反作用于物质生存的竞争。这就是文化安全作为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内生机制的系统性形成。

根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人类只有首先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需求，才能

从事艺术、科学、宗教等活动。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两个方面，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人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的社会意识存在，人类的意识存在又反作用于人类的生活方式，由此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当精神独立于物质存在又反作用于物质存在的时候，物质也就具有精神的特征，即文明性。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人类精神存在和精神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形态，也就都具有精神性了。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存方式和价值观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实践方式和表征的时候，就具有了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价值，是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美国历届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阐述美国国家安全时特别强调和突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根本原因。其实，不仅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如此，其他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也是如此。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真理之所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这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人们的价值观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但是，反映人们的社会存在的价值观一旦形成，便会对人们的生活本身产生极大的反作用，当这种反作用形成之后，就不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对人们的物质生活产生巨大的制约性作用，从而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具有了精神生活性，具有了价值。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安全、价值观安全作为精神安全的表现形态，对人们的整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安全性问题产生形式多样的挑战性和风险性，进而从物质生活的根基上动摇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安全系统，直接威胁和危害人们生存的全部价值。

3. 文化安全意识：忧患意识

文化安全是一个主、客观统一体。文化安全意识是文化安全主观方面的重要内容，忧患意识是它的核心特征。生存和发展危机生成关于安全的忧患意识。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先哲就在前人关于生命安全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并提出了“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③“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④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和命题，形成了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关于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它是后来一切关于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与思想的起源。忧患意识是一种立足但又超越现实状况，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判和防范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养成，因而是一种自我精神警示，具有文化安全意义。孔子关于国家治理的学说，即“兴观群怨说”^⑤“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论”^⑥和“亡国之音论”等是中国古代最早、最成体系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宋朝赵普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揭示了《论语》的真正功能和孔子儒学的本质：治理天下。后来的以“修齐治平”格言建立起来的家国情怀和关于个人、家庭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易》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② 《易传·系辞下传》。

③ 《孟子·告子下》。

④ 《左传·襄公十一年》。

⑤ 《论语·阳货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⑥ 《论语·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之道也。”^①常怀忧患意识可使人励精图治，丝毫不敢懈怠，从而形成一种内生动力。这种动力不只是一种具有消极被动性的防御或者抵御，还包含着积极主动性进取和创造性建构，通过主动作为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这是一种安全防卫能力提高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也是文化创新和文化安全能力提高的过程。几千年来，忧患意识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数千年来生生不息并不断创新发展的内生文化动力，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

文化安全的矛盾运动与冲突性质构成了文化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因而是度量文化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沉淀下来的所有人类文化遗产都是文化安全运动演化的积极成果，都是人类对同自然与社会矛盾斗争经验的总结结果。它们是文化竞争与文化选择的结果，成为人类文明进一步演化进步的“人类传世基因”。文化遗产、国家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文化遗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人类文明为自身建立起来的文化安全体系。这是人们认识文化安全的一个基本原理。没有文化安全和关于文化安全的意识，就没有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这种文化安全意识就是一种共同且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竞争意识，同时也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文化发展与安全意识。维护和捍卫文化多样性、文明多样性就是维护文化和文明生长所必不可少的生命内生动力机制，就是维护文化安全，确保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张力。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习近平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特别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②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皆由“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的忧患意识促成。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著名的“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就是忧患意识的结晶。



典型案例

“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

“甲申对”是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与郭沫若的笔谈。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的阐释明朝和大顺政权灭亡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看后表示赞赏，告诫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同志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窑洞对”是指毛泽东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次著名会谈。1945年7月，黄炎培来到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赶考对”是指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进北平前的一段对话。1949年3月23日，

^① 《周易本义·系辞下传》。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 人民日报, 2014-04-16.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同志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资料来源：百年大党面对面·遍数风流还看今朝：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N]. 人民日报，2022-06-08.

二、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

国家文化安全是人类社会进化发展到以国家作为文明形态和文明载体阶段之后产生和形成的国家进化与进步的文化生态机制。

国家是因人们的集体安全需求而出现的。它既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集体安全需求的产物。国家是一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在阶级社会，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它起源于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经由家庭、村落、都邑和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最高组织形式。^①它是一定社会的人们依据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权力机构，用来协调和配置社会资源，以实现有效的公共管理。诚如世界银行在《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中提出的：“维护集体安全的努力一直是人类历史的核心：从最久远的年代开始，人类安全靠的是合作这种认知就始终是村落社会、城市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促成因素。”^②

1. 国家与人的集体安全

国家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种集体安全保障机制。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而私有制是竞争性的，是对生产资料的竞争。当以有限的个人能力无法获得全部生活资料的时候，通过集体的方式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就成为人们出于本能的集体主义表现。通过集体行为达到保障自身生存安全的目的，这是一种集体安全机制。由于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影响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影响和决定了整个上层建筑的占有形式，于是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必然扩大和上升到对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物质领域里的安全问题也就扩大到精神领域，形成精神领域里的安全问题：占有与被占有、威胁与被威胁、剥夺与被剥夺。

国家自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安全保障机制。所谓“治而不忘乱”，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国家安全的一种认识。它是由“安而不忘危”发展而来的。但是，当国家进入国家时代，也就是说当人类社会经过了“酋邦”社会或“古国”社会而进入“国家”发展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超越了人类社会建立在生存基础上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观，而上升到以国家形式为主要安全存在和安全实现方式的时代之后，国家便成为“安”“危”的主体和来源。国家成为其国土和国民安全利益的代表。国家作为人类社会为了实现有效的治理和有效的安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集体安全形式和集体安全保障机制，也就历史性地成为人类文明社会创建的安全形态。当没有国家这种集体安全保障机制便无法有效维护一定土地空间范围内的人的安全保障利益的时候，建立这样一种集体安全保障机制也就成为人类社

^①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单行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② 世界银行. 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M]. 胡光宇，赵冰，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会安全事业的必然选择和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律。

2. 国家与价值观认同

集体安全意识和观念产生与形成于人们的生产过程。所谓的价值观念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就是对于同类的身份认同。建筑在同类认同的基础上，为了协调集体行为的一致性以实现获取生活资料效益最大化，把在下意识行为中建立起来的默契上升为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规范的时候，一种价值观念认同也就出现和形成了。这是一种以共同的物质利益为目的而形成的以共同精神心理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正是这种建筑于共同生活和生产行为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建构了彼此之间的文化身份，即关于家庭、家族和族群、种族的身份划分与确认。国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埃尔曼·塞维斯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中通过“酋邦”这一概念，清晰地解释了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国家演进的文明起源和文化过程。^①

国家是由不同的人们以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基础而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同一国家的人们以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以这种生活方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为身份认同，并且以此把自己与其他国家的人区分开，从而使国家形成自己的可识别的文化独特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现代世界体系。一种文化独特性和身份的可识别性是不同国家存在的具有自然法性质的合法性依据。一个国家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形式都是这种合法性赖以建筑的基础并且深刻地反映这种合法性。因此，这种合法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以此构筑一国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全部合法性基础。对这一合法性基础的任何威胁或可能带来的危险都会生成和构成一个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这是由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哪一种外在的力量任意建构的；相反，任何外在力量对这种内部联系的挑战都会造成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甚至引发地区安全危机乃至国际安全危机。2015年8—9月爆发的欧洲移民潮就是一个由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引发大规模国家安全危机，进而造成危机外溢，形成地区和国际安全危机的典型事件。

3. 国家与国家文化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由国家来定义。在当今世界，只要国家仍然是一个具体而固定的社会存在的代表，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就是由国家来定义的，其他安全问题和安全属性离开了国家这个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存在的最高级形态，也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解决。离开了国家这个行为主体，现今人类社会的一切安全问题都无法获得妥善的解决。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问题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只要人类社会依然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就是解决一切人类安全问题的决定性主体。因为在今天的国家体系条件下，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一定国家的具体的人，都有国籍，都受到国家的保护。而恰恰因为人都是属于一定的文化的，都有文化认同，都通过文化认同确立自己的身份归属，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文化人”。正因如此，国家在建构或解构文化安全的过程中具有其他一切非国家力量不可取代的作用。

文化冲突造成了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冲突常常是促进和推动文化融合的机制，而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一种更好地获得文化安全和提高实现文化安全的能力的过程。

^① 塞维斯.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M]. 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三、国家文化安全的规律

国家文化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 20 世纪才逐渐被作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来的，它是人类对一种现代社会国家安全运动与发展规律的发现。当人类把国家文化安全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它便成为研究现代国家运动的重要对象与范畴。国家是人类社会创建的一种集体安全形态与安全机构，对外防御敌人入侵、捍卫国家安全，对内依法实行统治与控制、维护政权安全和国民安全。它由一整套国家安全治理机器组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行使国家职能。

1. 国家与利益、命运共同体

国家是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国家既是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由共同的利益构成的。资源的稀缺性始终是对人类生存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因此控制资源和争夺资源也就自然地成为维护与捍卫人类生存安全的主要生态机制。当国家为维护本国国民安全利益、确保自身生存安全而展开资源控制与扩大资源来源的时候，国家间的争夺便成为国家间竞争和战争的主要手段和主要形式，从而陷入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国家安全困境——这也是西方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主要来源。西方社会二元对立的国家安全观念以及二战后形成的“冷战”和“冷战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霍布斯的国家安全理论为基础的。虽然，霍布斯的国家安全理论是以欧洲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安全经验为基础，以欧洲国家安全史为依据的，但是这一理论确实某些方面解释了国家安全起源和形成的某些特征，以及在现代国际社会和国家体系，尤其是在国家安全体系运动中的某些规律性，对于我们认识国家安全的起源及其在现代国际社会和现代国家安全运动中的特质，具有不可忽视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思想史价值。

2. 国家与文化认同

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是国家作为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根基。由于国家是由共同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建立起来的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作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观念形态与认同系统，在维系国家认同中具有特别重要的集体安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是由一种人们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形成与建构起来的集体安全体系。这种文化认同具有阻止社会涣散和建构国家的普遍凝聚力的作用，一旦这种凝聚力被解构、分化、瓦解了，国家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也就分裂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一些国家分裂重组为两个或几个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去了国家认同的共同价值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尤其是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文化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运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维护国家统一的国家安全价值。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作用，因此从价值观基础上，尤其是从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分化、动摇、瓦解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也就成为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集团对他国实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突破口，并由此建构了在现代世界体系下国家文化安全运动的根本属性和重要特征。国家文化安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认同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具有防御性和安全保障特质，从而也使国家

文化安全竞争与博弈集中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上，即文化认同与价值观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竞争与博弈的核心。

3. 国家文化安全与人类和平发展

追求和平发展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价值目标。安全还包括安宁、安定、安居乐业等含义。对于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来说，安宁、安定和安居乐业就意味着和平、没有战争，远离战争的威胁和危害。这就是国际安全和人类共同体安全。在文化的意义上，就是人类文明安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因此，安全不仅包含“危险”与“威胁、危害”的意义项，还包括“安宁”“安定”“安居”的意义项。这是我们认识国家文化安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系统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①“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既界定了“国家安全”的内涵，也规定了国家安全的标准以及关于和平发展的价值尺度，即什么才叫和平。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与倡导的“相安无事”，“非攻”与“兼爱”，“天下大同”；每个国家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且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扰、威胁和危害；人们按照自己的文化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发展自己、满足自己且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尊重文化多样性和文明的互相欣赏、借鉴，这就是和平。

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是一种目标状况，也就是说，有了危险和受到威胁就是不安全的。确保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需要拥有保障持续安全的能力。虽然从理论上讲，安全是相对的，不安全是绝对的。但是，对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人们来说，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最崇高的美好理想，是一切美好生活的标志。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安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由抗击和抵御威胁和危险的能力决定，抗击与抵御的能力越强，则越安全；反之亦然。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程度取决于抗击和抵御各种病毒危害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强弱。然而，只要客观存在各种潜在的安全风险，就可能面临危险或遭遇威胁。要确保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就必须具有能够消除危险和抵御威胁的能力，这也是实现和保障和平的能力。人、社会、国家的这种能力是在这三者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建立和塑造起来的。

从这样的意义出发，所谓国家文化安全，就是指国家追求与保障实现自身和平、安宁、安康的一种人类文明状态。当我们把发展看作为实现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存需要、不发展就不能继续生存的时候，任何对发展的威胁或面对的危险都成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指称的国家文化安全是人类文明共同体追求和平发展、具有普遍安全意义的人类文明安全的实现方式和实现机制。国家文化安全是人类普遍安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文化安全，就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安全，就没有人类文明共同体安全。国家的生命基础是文化。文化是国家的灵魂，没有了文化，就无所谓国家。国家因文化而建构，没有文化，有了国家也会灭亡；有了文化，国家灭亡或没有国家也可以重建或创建。文化安全事关人类文明安全全部基因的活性程度和可再生程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二节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及对象范围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国别概念。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都是一般国家安全整体中的个别对象，是对国家所处历史环境和时代安全状况的特殊反映。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是全球文化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安全演变发展的东方文明形态。它不仅是中华文明安全历史发展演变的产物，也是它和人类安全关系，特别是和现代世界安全关系发展的产物。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既是中国和现代世界文化安全关系发展的体现，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安全道路选择文化发展的历史性结果。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以它不同于其他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与其他国家文化安全相区别并确立自身在全球安全格局和文化安全格局中的身份和地位，参与世界文化安全事务和全球文化安全治理。深入研究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学和国家文化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认识、了解和把握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运动基本特征与规律的必要基础。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特征

国家特性与国家属性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是由当代中国的国家特性和国家属性共同决定的。国家文化安全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不同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性质是由不同国家的执政党的政党性质和国家性质决定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性质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1. 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与内涵

定义是对事物普遍性的归纳，性质是对事物特殊性的揭示。定义权是一种话语权，往往给定了定义提出者的解释权。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性质都是由国家安全性质的普遍性和国家安全的特殊性共同决定的，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在文化领域的延伸与表现，因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是对国家安全本质的认识与揭示，与国家安全的本质相一致。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原理，根据《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与内涵就是：国家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文化主权、人民文化福祉和国家其他重大文化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和塑造国家安全，推动文化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个定义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内涵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是对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本质属性同一性的揭示。

2. 国家属性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国家属性，即便是国家属性相同的国家，由于国家特性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差异，也会呈现出国家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国家属性决定着不同国家的文化安全性质，制约着不同国家文化安全发展道路的选择与理论方针政策的制定。所有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内容都充分体现了一个国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性、属性和利益。从理论上讲，没有一个国家是不捍卫自身国家主权的。同样的道理，没有一个国家不捍卫在本国国家主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确定自身一切合法性身份的、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为核心的国家文化主权。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都是通过国家政权形式行使国家主权和安全职能的，因此国家政权在全部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同时，由于一个国家的国家政权是由一定的政治组织和政党集团以执政党的身份组建的，而所有的政治组织和政党集团都有自己的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主张并力求以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主张统治国家，一个国家对国家主权和国家的价值认识与法律规定就是由这样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决定的。因此，它们所选择的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就决定了国家的属性。政治组织和政党集团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主张的性质，可通过法律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定义国家性质和改变国家性质。文化无论是作为它的核心价值观的表现还是政治制度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不体现了这种本质属性。国家政权的变动往往会导致一个国家主权地位、统一状况和领土完整的变动并由此导致这个国家的人民享有的各种生活与生存合法权益的变动，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其他所有利益的变动。文化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同时随之发生变动。在这里，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动，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的根本性质的变动，不仅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性质，即属性，也将同时改变由国家性质定义的全部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内容，包括国家文化安全内容。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价值观和制度体系，因此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属性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3.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是由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史的发展逐步定义的。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鸦片贸易和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迫使清王朝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不仅要割地赔款，还要允许列强在中国建立租界并在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主权管辖，这不仅导致中国国家主权严重沦丧，而且导致中华大地民不聊生，五千年中华文化惨遭践踏，中华民族自尊遭到空前伤害，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严重不保。迈入20世纪之际，中国国家安全危急到了极点，人民生存危难到了极点，民族存亡危险到了极点。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国家属性，摆脱国家的不安全状况。正是在民族与国家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为拯救民族、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勇敢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空前的拯救国家安全的民族使命，并通过28年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向世界、向整个人类文明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

站立起来了！”^①这宣告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安全的旧时代的结束，宣告了中华民族一个崭新的追求国家安全、民族平等的伟大时代的到来！国家属性的根本改变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五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新国家安全时代！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便立即向全世界宣布：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文化特权，在收回国家主权的同时，收回国家文化主权。新中国由此而开始进入现代以来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新纪元。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国宣布废除私有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将其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国家政权执政者和组织者的政治信仰、政治主张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主张，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的历史性成果。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也决定了新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本质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性质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国家属性，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国家安全属性以及由这一国家属性而决定的全部国家安全内容。

《国家安全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了制定《国家安全法》的目的和依据：“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宪法》是认识和掌握中国国家安全本质属性的法律依据，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属性和内涵做出了合法性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三大核心要件构成了当代中国最本质的国家属性并使之同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权形态与国家属性相区别，也因此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文化的本质属性并使之同一切其他国家文化相区别。必须且只有从这三个最基本的国家属性出发，才能确立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全部合法性。这是认识和掌握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一切理论、政策与战略，树立国家文化安全观和履行国家文化安全权利和义务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②这就是当代中国国家文化的本质属性，正是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特征，所有关于中国国家安全和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本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6。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2）。

质属性都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并服务、服从于这一基础的。维护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决定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部使命责任，定义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部本质属性，也是中国文化安全立法工作的法律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①

二、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与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

每个国家都有立足于本国国家文化安全国情实际的特殊性。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上。国家文化安全既是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映，同时又给予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以重大影响。

1. 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

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是国家文化安全运动与发展中最基本的安全关系，也是影响国家安全发展最重要的安全理论与安全政策和战略问题之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需要处理好国家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关系。没有政治安全就没有国家文化主权安全，没有文化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就失去精神文化保障。保障政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使命和责任。在中国，政治安全是攸关党和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只有从维护政治安全的高度认识和规划国家文化安全工作，才能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都包含深刻的文化内容。

政治安全决定文化安全。“政治安全，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由政权、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要素组成的政治体系，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面对风险和挑战时能够及时有效防范、应对，从而确保国家良好政治秩序的能力。政治安全是我国国家安全的根本，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②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中国政治的集中体现和象征，它标志着中国从此获得了独立自主、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的主权。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集中体现。维护和捍卫这一主权是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一政治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就成了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两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安全，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就将处于没有制度安全保障的危险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安全、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安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中国，政治安全攸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政治安全是国家的“心脏”，它的状况与性质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国家机器其他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安全状况和安全行为。没有政治安全，也就没有国家其他各个方面的安全。没有政治安全就没有文化安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 (2).

② 本书编写组. 国家安全知识百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41.

全，这是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最一般的安全关系，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

因此，《国家安全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国家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行为；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窃取、泄露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境外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以上内容划定了国家安全发展的政治底线，任何文化行为和内容都不能逾越，也不可挑战这一国家安全底线，因而划定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这是我国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安全关系。

文化既是政治、经济在观念领域里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这是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最一般原理，也是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一般关系的原理。“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①这是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安全发展过程中，重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和价值观体系的历史经验得出来的重要结论。政权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通过意识形态，即通过文化对我国制造“颜色革命”，是我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安全挑战。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塑造什么样的国家政治安全。苏联解体就是文化安全塑造国家政治安全最为惨痛的社会主义教训。在这里，作为文化的核心领域的意识形态能否守得住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政治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的成败。文化安全在这里具有全部的国家政治安全的战略保障意义。

2. 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②这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一个战略任务。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2015年12月25日）[M]//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7。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24日）[M]//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7。

和向心力。”^①“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②在总结国际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风险失控的重大危害性：“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③他极为沉痛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④思想意识形态是文化的灵魂。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政党和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深刻揭示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在整个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中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战略安全意义。

文化安全是意识形态安全实现的载体形态和存在方式。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形态，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价值观内容。意识形态是发展变化的，文化的价值内涵和内容随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意识形态属性是影响和决定文化属性的重要变量。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执政主体的不同影响和决定了不同国家和政权主体的性质，也影响和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文化安全的性质是随着国家安全性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也是随着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意义上都是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力量，同时又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有着不同的分工。

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文化是一个体系，既包括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也包括人的精神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体系和精神系统，既深刻地反映在人的价值观层面上，也反映在人的生活方式层面上，而生活方式又是人们认知经验的行为表现。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人的意识形态的来源，而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由此而形成了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性和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性。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和凝集为价值观并通过价值观影响人们的行为而标志自己的存在。于是，当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价值观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时候，价值观和价值观念体系就具有塑造和改造人们生活方式的功能。在这里，意识形态就具有了安全的意义。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念的体系构成，能否为一种生活方式提供长久的安全支持和安全保障就成为意识形态是否安全的重要标准。而也正因为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安全保障的意义，所以把意识形态作为突破口，对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分化瓦解和渗透颠覆，也就自然地成为国家安全博弈的重要领域和重要手段。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自然地、历史地成为维护和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任务。

意识形态安全决定文化安全的发展走向和实现程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

①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M]//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8。

② 习近平。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M]//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9-10。

③ 同①：9。

④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EB/OL]。（2013-01-05）。http://china.chinadaily.com.cn/2016-10/20/content_27123201.htm。

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这是定义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根本原则。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和基于一定思想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念所指导的。在中国，坚持以什么思想理论为指导是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关系到政党的性质、国家的方向，关系到民族的命脉、人心的凝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决定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目标和方向、政策和主张，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精神支柱和最鲜明的身份标识。正是这一身份标识，鲜明地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和精神标识，建构与决定了当代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行为的马克思主义性。

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文化是一个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表演艺术和互联网在内的庞大的精神产品生产体系。所有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工具和传播手段可以为任何阶级、任何国家和任何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所用。掌握和利用这些文化生产工具和传播手段，开展对他国的舆论战、信息战、文化冷战等是 20 世纪以来世界意识形态斗争最显著的特征。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文化是服从与服务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一定国家利益的。要使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朝着有利于本国最根本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就必须把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地缘政治主张全部贯彻到所有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之中，以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便决定了什么样的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这是国家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客观规律。利用这一规律对我国实施意识形态渗透与颠覆是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长期面临的挑战。

价值观是意识形态构成的核心要素。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影响和决定了整个文化系统的生命运动。没有了价值观，文化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文化的影响力首先就是价值观的影响力。正因为文化的影响力取决于价值观的影响力，对价值观的争夺也就成为对整个文化争夺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就是价值观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最集中、最本质的体现，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正是由于价值观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具有“中轴作用”，因此对于价值观的争夺也就成为文化争夺的关键。在这里，价值观安全即意识形态安全直接地影响和决定了文化安全的前途命运与发展走向。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教训。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动荡、政权更迭往往始于思想领域的混乱、指导思想的动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前车之鉴。“我国文化建设的长期实践表明，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得好、把握得牢，就能形成文化繁荣兴盛的生动局面，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坚持得不好，发生动摇和偏差，就必然造成思想文化上的混乱，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损害。现在，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社会文化生态更加复杂，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同时存在，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积极的和消极的相互影响，民族的和外来的相互碰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领多样化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①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只有高度自觉、始终不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道路不偏向、江山不变色，保证国本永固、事业常青。因此，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正确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3. 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联动性

“安全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紧密相关，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个看似单纯的安全问题，往往并不能简单对待，否则就可能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恐怖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滋生蔓延受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宗教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单纯靠一种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②这既是当今世界国家安全运动的基本规律，也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性质的特殊性。文化和政治密不可分。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有时相辅相成，有时则发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夹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学术、艺术、自由等概念和问题永无止境地缠绕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国家安全关系，成为国家文化安全中最复杂、最重要的安全关系之一。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非传统文化安全威胁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突出的共同文化安全问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安全进程与走向。“三股势力”不断地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是造成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联动性最突出的现象和因素。

文化是政治的一种权力形态，即所谓的“软实力”。国家政治安全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的性质决定了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性质。没有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提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也将失去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制度属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既是对这个国家政治安全与制度安全的反映，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为其提供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保障。

三、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对象范围

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象领域。“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③这既是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特征，同时也是国家文化安全所处的环境形势特征。正是这样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的构成性。

1.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对象范围的构成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对象范围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由中国国家文化的本

^① 黄坤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N]。人民日报，2019-11-20。

^② 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习近平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9月26日）[N]。人民日报，2017-09-27。

^③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0。

质特征构成的在核心内容意义上的对象范围；二是由中国国家文化在制度意义上构成的对象范围。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对象范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来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三大内容属于国家文化主权的范畴，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对象范围的核心部分。

以这三大核心部分为依据，在这三大核心部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主体根据《宪法》和法律依法行使国家文化主权的领域和行使效力的范围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在制度层面上的对象范围和领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思想宣传、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表演艺术、视觉艺术、互联网等所有属于国家文化主权范畴的文化领域。这一领域既可以按照国际通行的行业来划分，也可以按照学科和学术等思想意识形态来划分。

前者（本质特征层面）反映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对象领域的特殊性，后者（制度意义层面）体现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在制度架构层面上的普遍性。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对象范围和体系结构。

文化成长系统中，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领域都以一定的文化主体、主干为基础，按照自己的发展形态、发展形式和发展模样发展，宛如一棵参天大树是由树干、许多树枝和树叶构成的，树枝和树叶使大树获取自己生长所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同理，所有的以载体形态呈现出来的文化外延都是文化生命整体富有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让一棵大树获得成长养分的重要生态机制。就像一棵大树没有树枝和树叶的光合作用就不能获得供生命成长的营养一样，文化如果没有相应的表达形式和载体工具，就无法建立与人类社会的价值联系，也就无法获得文化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来自人类社会自身的需求。因此，一个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不仅取决于国家的内涵式成长，而且需要国家的外延式繁荣发展。没有发达的国家文化载体体系，即没有发达的现代文化生产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体系，没有成熟和完善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就没有国家文化安全应有的文化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生态构成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文化安全的外延就是指所有的文化生产、表达和载体系统。这既是国家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文明最重要的呈现体系。由于任何一个文化载体系统的安全程度都会影响到国家文化安全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安全程度。因此，对文化载体系统和载体机制的国家安全掌控也就自然地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

2.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发展与对象范围扩大

国家文化安全的范围随着不同时空条件下人们互动历史的拓展而不断扩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家的政治文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就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深化进程推动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而不断发展变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 (2).

化的。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和塑造了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并确立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内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文化权益和文化安全服务的对象范围，同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法理基础；改革开放后，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和形势，中国在实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的同时，实行文化领域里的改革开放，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制度性形式重建了中国与世界的国家文化安全关系，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处理国际文化安全关系，从而在重返世界文化市场体系的同时，极大地丰富、扩大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领域，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同时，丰富、提高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国际竞争力，丰富、充实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内容；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遭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双重挑战和机遇，对发展与安全同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国际国内形势双重挑战所提出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更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发出了“全球安全倡议”。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深刻地丰富、扩大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而且为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与外延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内容和历史内涵，使之不仅是中国化的，而且具有全球安全、进而具有全球文化安全的意义。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边倒”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方位、多元化全球安全，这是一个具有人类文明安全史意义的发展和变化。在现代世界体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国际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现代国际安全体系的任何变动都会引发一个国家安全环境的更大变动，同时国家的这种变动又反作用于国际安全体系和结构的变动，如此循环往复，构成国家安全的矛盾运动。在这里，国际安全环境和国际文化安全环境的变化是影响和导致一个国家文化安全内涵和外延变化的最重要的变量。正是这一变量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的发展与扩大。

以美苏争霸为核心的“冷战”直接影响和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的发展变化。“冷战”“全球化”“逆全球化”是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国际安全和国际文化安全运动发展呈现出来的三大发展阶段和发展形态。这三大发展阶段和发展形态在塑造世界文化安全格局的同时，也不断地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内涵的发展与外延扩张造成深刻影响，是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运动变化最根本的变量，在改变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内部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环境的变化和体系性塑造。新中国70年发展史反映了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扩大的历史以及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和结构不断现代化的历史。

国家安全是一个体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生态等各方面、各领域，具有不可分割的系统性特征，诚如一棵参天大树。真正决定这棵参天大树长成什么形状的是这棵树的本质属性。年轮完整地记录了一棵树在生长过程中接触的全部生态信息，包括气候变化、曾经遭遇的自然灾害等。年轮的生长过程就如同文化积累和积淀的过程。年轮的多少记录了树的年龄，即树龄。而文化发展的历史纪年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以技术工具为代表的不同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则记录了文化载体、文化工具的生成，即文化外延的伸展与扩张。而所谓的文化遗产就是人类社会对过去年代人类创造的文化遗存、文化遗物的集合性表述。诚如一棵大树的年轮一样，人们可以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分析研究，了解人类发展的成长足迹以及他们与整个历史环境的关系。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自信、历史自信

的来源和根据。在这里，当原有的文化生产手段和文化生产工具即文化生产力不足以满足文化生产关系发展需求的时候，通过和借助于技术手段丰富、发展文化生产和文化表达工具，打破旧有的文化生产力垄断格局，塑造新的文化载体和文化产品形态也就自然地成为新生的文化生产力创造性诞生和涌现的必然逻辑。这是一个不同文化生产主体不断地争取文化自主权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文化安全的对象范围随之扩大。工业文明时期出现的电影、电视，信息文明时代诞生的互联网，借助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发展出来的网络文化以及 VR、AR 等人工智能和数字文化产品都是在国家文化安全内涵的扩张中生成的，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外延系统。

四、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变化的互动性和联动性

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是一个不断地产生成长性变动的整体系统。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随国家本质属性的变化而变化。不仅不同的国家关于文化安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家属性的差异，在相似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下，文化安全的具体内容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有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权属性和社会制度决定的。同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个时期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这两个时期由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执政党执政，那么，这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权国家对于文化安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两个具有本质属性差异的对立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属性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形成了不同属性的文化，而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在获得了一个国家的政权，行使执政权力的时候，一定是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按照本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统治与治理国家的。因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和内涵就必然打上其所代表的阶级文化利益的深刻烙印并且通过一系列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政策、制度和法令深刻而具体地表现出来。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和治理权之后，废除原有的代表先前阶级利益的文化政策、制度和法律，重新定义国家文化安全，重塑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以代表和反映新的执政者所代表的阶级的根本文化利益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这样的国家文化安全内涵的历史性变动，必然同时要求和推动所有的国家文化安全外延，即要求和推动文化表达和生产的对象领域同时进行这样的根本性变动，以适应和符合新的统治阶级对于文化的要求。1949 年以前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内涵和文化生产与表达的对象领域是由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定义的，反映和表现的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根本文化利益；1949 年以后，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是由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定义的，反映和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文化利益，因此明确要求文化艺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维护和捍卫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内容的国家文化主权成为新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目标对象。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更深入地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数字化生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人们关于数字化生存和数据化观念的接受与养成，深刻地影响、重塑、丰富和扩大了人们的文化安全范畴，这种范畴的扩大也导致

国家文化安全的外延和对象范围发生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同时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予以深刻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思潮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文化安全问题，正在生成一种全新的国家文化安全环境和非传统安全意识形态，挑战并影响着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形态与发展走向。这种具有发展性的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的互动演变趋势将长久地影响和改变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的发展。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将在这个进程中被重构，并将重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作为文化发展的载体系统，文化外延有着自身的生长规律与生长需求。竞争性与扩张性始终是文化外延变动的突出规律。在文化内涵不变的情况下，文化外延是可以随着文化内涵的生长需求而不断地往外扩展的。当不发展文化表达的载体系统和文化生产力现代化能力便不能有效地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主权、人民文化福祉和国家其他重大文化利益的时候，扩大外延和丰富内涵将同时成为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变动的运动形式与运动形态，推动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的相互促进与发展。

外延作为文化的载体系统，对内涵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尤其是当外延具有掌控舆论导向和制造舆论的功能，成为政权稳定和国家治理中重要的国家安全工具的时候，通过掌握文化的载体系统进而实现颠覆政权和改变国家性质，便成为维护或危害现代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政权解体及其国家属性发生改变的过程中，媒体犹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颠覆了苏联的共产党执政地位，改变了其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性质。苏联的国家文化安全性质也随着国家属性和国家安全属性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一个通过外因而使内因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典型国家文化安全案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他的《大国悲剧》中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描述与历史性总结：“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必先造成舆论。”同样，凡是要颠覆一个政权，必先夺取舆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①这就是国家文化安全内涵与外延变动的辩证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安全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

第三节 国家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主要任务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主要任务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一样的，随着历史和国家属性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对于国家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现，以及对国家文化安全任务的规定，也是随着人们对国家安全性质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深化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研究成果的丰富而不断丰富、发展。这是认识当今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主要任务的前提。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总体性国家安全系统，广泛涉及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的所有国家安全领域和方面。只有从总体国家安全

^① 龚自珍《定庵别集·续集》《古史钩沉论二》。

观和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总体性出发，才能认识国家文化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主要任务。

一、国家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人民幸福安康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是这个时代的民族和国家精神的集中体现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民族和国家精神的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的标志与象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理想信念追求的保障，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支撑，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国家安全是一个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各领域的生命系统。虽然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安全定义和安全内容，然而，没有一个领域的国家安全处理方法以及安全制度与思想理论观念的建立不以这个国家关于安全的价值观念为指导。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俄罗斯有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政策，东方有东方文明关于安全的认知与经验，西方有西方文明关于安全的认知与经验，不仅表现在整体性上，而且表现在具体的国家安全领域。国与国之间在国家安全理论与政策上存在的差异（有些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差异），根本上就是基于本国国家安全利益而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体系的差异。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从本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文化立场出发，来制定本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维护本国国家安全利益，为本国国家安全提供道德保障的。习近平说：“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挥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①其所揭示的就是文化安全的普遍意义及其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关系的具体而特殊的意义。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②“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M]//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39。

^② 同^①：240。

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①

文艺是最重要的文化表现形态之一，具有强大的武器性。在战争中，它既是打击敌人、瓦解敌人斗志的有力武器，也是团结民众、鼓舞民众、唤起民众保卫家园和国家最有效的精神动员力量。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外，文艺力量往往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之一。通过和借助文艺影响战争进程，制造有利于自己的战争环境，引导战争的发展方向，一直都是军事战争的重要手段之一。1935年，随着电影《风云儿女》在全国的上映，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唤醒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走上抗日的战场，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吞没了日本帝国主义。“长城”是中华民族御敌于国门之外、捍卫国家安全的精神象征。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而音乐作为这种灵魂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是最能够体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之中，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它集中地反映和表现了在那个年代中华儿女为抵御外侮，英勇地走上抗日战场的伟大壮举。“义勇”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表达。在需要鼓舞、动员、号召的时候，文化以它坚强而又充满韧性的、渗透于人的灵魂的力量，迅速地动员起中华民族，赋予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灵魂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使得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近代以来屡遭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之后，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奋然而起、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空前的民族胜利，一洗百年耻辱！并因此而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抗战文艺”。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安全的文艺，是国家安全文艺，包括国家安全电影、国家安全音乐、国家安全戏剧、国家安全小说和国家安全诗歌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具有武器性，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正是因为文艺的这一功能与特征，使文化具有了武器性。这就是文化被称为软实力的重要原因。文化软实力成为现代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国家安全能力。^②

“靡靡之音”自古以来在中国就被称为“亡国之音”，是文化不安全的一种表征。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否定新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娱乐至死”的文化危机现象，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的讲话不无沉重地告诫大家：“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不能被轻歌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N]. 人民日报，2016-05-17.

② 这一历史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其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就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作品——《C大调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曲》），它也是一个呼吁国家安全的伟大作品。

曼舞所误，不能‘隔江犹唱后庭花’。”^①他引用唐朝诗人杜牧的千古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②来警示人们，足见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安全具有作为国家安全重要保障体系的地位和作用。

二、国家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地位决定作用，作用体现价值。国家安全是一个系统整体，由各个不同的方面共同组成。这些不同的方面承担对于总体的不同责任，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推进国家安全总体的系统运动和科学发展。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安全，它随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而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系统中起“保障”作用的安全功能定位，深刻阐明和揭示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1. 文化安全是统筹推进国家安全总体布局、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国家战略部署，是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安全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部署上，从发展了的国情和发展了的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创造性提出的统筹推进“两个布局”，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我国发展新特征确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抉择。”^③这一战略布局是中国在全面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确立起来的国家发展大战略，是随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步被提出来的，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认识和理论的升华过程，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文化特征，同时也是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这是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制定的一项中长期发展战略和百年大计。这一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大战略，具有跨世纪的建构性，集中体

①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的讲话，转引自：“娓娓道来，品读今年以来习近平引用的那些诗词典故”（三），2019年5月24日，来源：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9/0403/c85037-31010716>。

② 唐·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③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6-11-3（2）。

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有机统一。

“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四个全面”是战略目标，“五位一体”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根本路径，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总体布局。文化是“两个布局”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灵魂，就是要用先进的价值观武装人民，为其他“四个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营造丰富多彩的新生活、新文化环境。精神动力主要是指价值观层面，文化安全在其中起到了精神支撑作用。一个文化不安全的国家难以进行伟大目标的建设，因为任何伟大奋斗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文化来凝聚、提供力量。这是一个全新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布局，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为“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成果，为各个领域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可能给国家文化建设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威胁和危害国家文化安全健康发展的意识形态都可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走上歪路、邪路，甚至使这一中华民族的世纪大计毁于一旦。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实行的基于“新思维”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俄罗斯的巨大、灾难性失败就是源于国家文化安全的丧失，由于被各种各样的脱离苏联和俄罗斯国情实际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所左右，最终葬送了苏维埃历时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实现俄罗斯民族复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文件。

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事业具有重要的智力支撑作用。国家文化安全状况影响着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支撑程度。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不能为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智力支撑，将严重迟滞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在文化建设与发展尤其是在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根本导向上遭到外来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误导，甚至会严重干扰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性。

舆论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具有动员社会民众、左右影响社会情绪和社会思潮发展走向的功能，具有强大的解构或建构社会发展精神价值取向的双重作用，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习近平指出：“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舆论作为一种重要国家力量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和各种阻击我国发展战略的挑战，习近平明确指出：“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有效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引导好人民思想，而要引导好人民思想就要引导好社会舆论。”^①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全局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安全在协调推进我国国家战略方面的重要支撑价值。在这里，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和人民之福，错误的舆论导向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M]//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9。

党和人民之祸。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①没有正确的舆论导向，没有舆论安全，就没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顺利落实，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因此，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更加自觉地用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文化安全发展。

2. 文化安全是构建国家安全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

文化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运动中具有能够撬动战略性结构的杠杆作用。中国国家安全发展正在从传统国家安全向传统与非传统国家安全同步发展、交叉发展、叠加发展转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正在推动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形态与格局朝着构建国家安全新格局发展。构建国家安全新发展格局必然同时提出对构建国家文化安全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以满足和适应与构建国家安全新发展格局相对应的新需求。进一步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强化文化赋能，充分发挥文化在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品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是贯彻发展安全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传统国家安全与非传统国家安全发展不可或缺的国家安全支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需求，在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的同时，还要给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感。其中，文化安全是重要因素。扩大优质文化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全面贯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也就历史性地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文化安全在构建国家安全新格局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文化是重要领域，必须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更好地以先进适用技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塑文化生产传播方式，抢占文化创新发展的制高点。

3. 文化安全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的文化软实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②长期的疫情危机使得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大数据推送造成的“信息茧房”加剧了网络用户的政治极化与群体同质化，又变相地对民粹主义进程推波助澜，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排外主义声势。民粹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全球政治、国家治理与人类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激烈的冲突碰撞中，人类在呼唤、寻找和创造着世界文明新形态下的理论支持与思想共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文化是重要的力量源泉，面对国家安全发展遭遇的世纪挑战，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化解新矛盾、迎接新挑战、形成新优势，需要文化安全发挥重要软实力的作用，高扬思想旗帜、强化价值引领、激发奋斗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铸魂，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M]//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8。

^②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1）。

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持久而深厚的精神动力；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4. 文化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战略目标。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向人们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②为此目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艰苦卓绝的探索创新，不断地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创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方面的改革创新，为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成果，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及其文化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中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为建立与国家主权独立相一致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文化安全制度体系，领导全国人民收回国家文化教育主权，荡涤旧中国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普及国民教育，取得了基本扫除文盲、初步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等一系列成就，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安全环境和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比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更加伟大、更加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文化为这个伟大工程提供所需要的更加强大的精神文明基础。文化安全就是这个根本性基础。正如物质隐患会让一幢高楼大厦发生楼倒人亡的安全危机事件一样，文化隐患也会让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归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悲剧。苏联的解体有许多原因，正如已有的所有分析研究所指出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放弃对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崇高追求，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转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导致和造成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国家文化安全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苏联是人类历史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是社会主义的灯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就是以苏联为榜样成立和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全新的精神文化体系。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文化体系。它是从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诞生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否定。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发展自己，最终要为人类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从文化方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化目标，这就构成了它与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领域里的全面冲突，从而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长期的安全矛盾、安全竞争与安全冲突。正是这样的两种不同思想、两种不同社会和两种不同道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M]//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4。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7。

之间所蕴含的、关于人类根本利益分配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决定和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部矛盾和冲突之间的安全性质。正是这样的安全性质规定和决定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永远的安全威胁。当这种安全威胁呈现在文化领域里的时候，文化安全的实现性程度就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而通过和借助于文化的特性进行对社会主义的渗透干涉，利用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对社会主义进行意识形态颠覆，直接威胁和危害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和文化颠覆的政策与战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文化安全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来说是根本性战略基础。没有这个根本性战略基础，就无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根基。一旦这一根基动摇了，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事业必将地动山摇。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精神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①

三、文化安全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主要任务

文化安全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根据对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功能定位，《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任务的规定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1.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这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对国家文化本质属性规定和要求的反映，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本质属性的规定，即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文明之后追求的人类文明社会的新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把它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它从革命的理论转变为革命的实践，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革命的理论还是作为革命的实践，都代表了人类社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这个方向，而不是别的其他什么主义的方向，才能救中国。这个方向早已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被揭示出来并得到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被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坚持这个真理，也就自然地成为中国一切发展道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历史选择。而这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3 年 5 月 4 日）[M]//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80。

恰是中国近代以来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发展没有理由不坚持这个方向。

2.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国家特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前述规定在揭示了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性质和构成的第一个方面，即首要方面之后，揭示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另外两大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创造的革命文化。这个文化是包括了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造的文化，即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所陈述与概括的人民文化。这是中国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来源，揭示了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任务的历史联系与历史关系，阐明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立场态度和继承原则，从而赋予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任务的历史性。“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任务中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对于文化遗产态度的普遍遵循；既具有中国特性与中国属性，又具有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遗产安全的普遍性。它揭示了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个别性中的一般文化安全意义。

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

社会主义文化是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在价值观领域的反映和要求。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不仅反映了不同国家和社会制度条件下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而且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的态度、立场与世界观以及他们对同属一个地球的不同价值观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中，核心价值观和对核心价值观的维护都是这个国家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和要求。其中，既有人类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的相似性与共同性，也有只适合于本国、本民族人民生活方式与习俗的特殊性。即便在同一个国家，也会留下一些陈规陋习或不良文化。所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触的文化都属于不良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要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

4. 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这是一个同时包括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两个方面的综合文化国力建设的目标任务。维护国家安全，既要运用策略，又要较量实力。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文化力量形态。这一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文化安全实现的水平高低。在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方面总体处于“西强我弱”状况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我国基本文化国情，这是导致和形成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风险和危机大多来源于这一相对落后状况。改变这一总体实力不强的相对落后状况是由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决定的，也是由中国总体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决定的。落后就要挨打，政治、经济上是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要彻底改变中国有理说不出、传不开的局面，赢得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一致和相匹配的国家文化安全实力和竞争力优势，就必须增强国家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是一个包括文学艺术创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文化产业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内的综合性国家文化安全力量体系。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将随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国情总体状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直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实现，因而也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重要变量。

以上四大任务实际上提出了如何实现文化安全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的四大体系和四大根本战略路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工作和战略将全部围绕这四大体系展开。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涉及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多维系统，既面临现实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挑战，又被过去和未来的国家文化安全所缠绕，由此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空构成的复杂性。今天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诚如习近平所说，时空范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正是这种复杂性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部挑战性。



本章小结

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及其对象范围是一个国家制定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前提，是国家安全需求在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的集中反映，体现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安全意志和价值追求。一个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一般性与个别性的统一，有着不同的国家文化内涵与外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是由中国国家的历史特性和现实属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来源和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特征与对象范围，决定了国家文化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这是认识、了解和把握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理论基础，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的国家文化安全知识体系的出发点。



思考题

1. 怎样理解和认识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与外延？
2. 怎样理解和把握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
3. 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性质特征是什么？
4. 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是什么？
5. 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